◎在场

# 美与荒芜在场

□ 李　浩

绥宁苗寨
理叶子绘

路途迢迢，我们颇费辗转地来到了绥宁，而这迢迢也似乎让我们“走出了时间”，走进了古老和一种具有遗迹感的美中。

荒芜与美同时在场，并且紧紧地、奇妙地合在一起——走进湖南绥宁的苗寨，我们仿若置身于另一个时间里，它似乎并不具有“当下感”，我们也仿若成为了可贵的“旧物”。在这里，流水都是古老的，空气都是古老的，树木上那些苔痕也都是古老的。更有古老色泽的，是苗寨的砖与瓦，是那些被时间所浸洗着、长过了个人生命的一栋栋木屋。据说，在大园村，一处最为古老的老屋已有八百岁，墙砖上所刻下的文字记录着旧光阴，只是，在岁月的不断击打和磨损之下有些字已经难以辨认。大园村村口的鼓楼原为明代建筑，上下三屋，楼阁式攒尖顶，气势雄伟；而“四知堂”则因杨氏远祖杨震而在绥宁一带声名遐迩。杨震，东汉时的官员，清廉有名，学生王密深夜送金被他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四知”的理由拒绝，这“四知”也曾深深地影响着大园古苗寨的杨氏后人。据说，在旧时，每到过年过节，大园村家家户户都会悬挂“四知堂”的灯笼……

古老。一切都是。在绥宁的古苗寨中，时间可能是更为缓慢的，有着独特的凝滞。在这里，连风的吹拂都有些慢，包括雨滴的下落。在这里，我们似乎完成了不可能的“穿越”，进入到历史中——只是，我们遇不到任何属于历史的熙攘。

在路上，在接近古苗寨的行程中我就生出了让人如同置身于画中的想法——让人如同置身于画中，我说的是传统的山水画，那房屋的感觉，树木和流水的感觉，就像是中国传统写意的描绘，它完全地“符合”于我们对传统的想象，完全地“符合”于我们对传统和古老的理解，我，似乎在古人的绘画中见过这山、这水，这房屋和这桥。如同置身于画中：其实，它也完全可以用油画或者水彩来描绘，油画更能体现时间之厚和苍老，而水彩，则可以画出它的洇蕴和灵动。对于学过美术并且一直深爱着绘画的我来说，每一处，每个角度，几乎都是写生的好题材，何况还有晨与昏、午与夜的不同。那些很有美感和特色的旧房子，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挨拥在坡地上，石阶斑驳，竟有些细细的小草从缝隙中探出，它成为生机的部分，却往往会被踩踏得已不成样子。

和村寨相匹配的是茂林修竹，是延展着的、起起伏伏的绿，在大园古苗寨如此，在插柳村苗寨也是如此，而上堡，则有更大的一片葱郁的树木，它几乎是连绵，把上堡包围在里面。在每座苗寨的后山上，都有数量众多、粗壮巨大的古树，无论是河边的枫杨还是山上的樟树、枫香树与黄岭黄檀……它们多数有百年的树龄，最为粗大的古树已达上千年。遇见它们并不需要行路多远，只要几百步，只要顺着布满了落叶的石阶前行——它们也是古老和沧桑的见证之物，风过、雨过、霜过、雪过、枯过、荣过的痕迹都展现得淋漓，无可掩饰，在插柳村甚至有株千年之老的大树，树心开裂已经中空，通向山坡的台阶即从树心的位置穿过，一人可从容地经此上山甚至不需要怎样弯腰。然而这棵早已中空的树却依然长得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我想，它们能够得以距离村庄如此近地存在，应是源于古代苗人们的“保护意识”，他们懂得珍惜什么，保护住了什么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和树和竹一起生长的，还有间或的鸟鸣，还有静谧。每座苗寨都是静谧的，我们见不到惯常的人流与车流，也恰是因为如此它才会带给我们一份“走出了时间”的错觉。无论是古老村寨的美，还是层叠向上的树，还是这份想象不到的静谧，还是带有些水气和草木之香的空气，都显得有种古典的“奢侈”。

或许，我应当说静谧，说古典，而不是荒芜这个词？

我谈到荒芜，是因为在古苗寨里一切都有一种“原始”的模样，走在斑驳的石板路上，我不自禁地想起了庞德的那首诗《罗马》，那里面充满着对时间的感吁。繁华落尽之后的古苗寨何尝不是如此，它留在那里的只是物，只是美得令人发指的旧院落，只是缓缓的、依然有着洁净感的流水……它给我一种桃花依在、人面无踪的怅然。当然，如果仅止于此，我是不会用出荒芜这个词来的，我要说的荒芜必须是程度上的加深，譬如年久与失修。在我所到的绥宁苗寨，除了上堡的某些旧屋改造的商店，其余的则都带有年久失修的味道。大园村，时下已经“无主”的旧房很多，它们和自身的美以一种缓慢腐朽的方式呈现着时间之重，甚至尘土之重。木梯还在，但向上的横木已腐，没有谁敢于再向上攀登；木窗还在，但窗棂已损，雨水会随风浸入到屋里面。那栋拥有八百年历史的旧屋里面充塞着种种不用的旧物，甚至存有一个鸡笼，几只鸡在里面咯咯咯咯地叫着。“如果它们得到些修缮，如果它现在还有人居住……”同行的朋友中，不时有人感慨，有些旧屋如果有人居住它们可能会更好，可能会大大地减弱它的荒芜感。我要谈到的荒芜还在于，在这些静谧的苗寨里，我们几乎很少能见到年轻人，见到的多是老人和孩子。青年人呢？孩子的父亲母亲呢？

在画一样美的苗寨里生活的人越来越少。美，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计，而且久居于这种太过古意的美中，他们也许慢慢无感，余下的，便只是倦惫，对每日繁重劳作和收获甚少的倦惫。

我询问过几个家庭，得到的答案基本一致：外出打工去了。是啊，他们得挣钱养家，他们也应见一见外面的世界。他们也应当，过得更为舒适些、丰富些。他们，或许最终落脚于某个城市，至少是县城，除了一些节日再不回来。这无可厚非，只是苦了那些留守老人和孩子，特别是孩子。

两难全。在返程的时候我们也曾想过如何能够解决这一“两难”，它不仅是绥宁苗寨所面临的两难，也应是诸多地域的乡村所面临的——然而我们没有统一的、能够自我说服的答案。就我个人而言，我极为希望绥宁古苗寨的这份美能够留住，它所具有的古朴的美、传统的美是不可再生的，我和我们当然希望它留住并且延绵——要知道，这些大大小小的古苗寨既是风景也是文化的某种活性的化石，但我无法合理地说服年轻人留下来安于贫苦与生活的种种不便，让自己也成为化石的某一部分。在恪守传统和现代选择之间，我承认自己会倾向于现代更多一些，但又不会全然地偏坦于现代；就那些具体的个体，那些在这里生长的青年人们，打工辛苦，背井离乡辛苦，而将孩子交给老人照看则更有别样的辛苦，可是，除此之外，我们又能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安置他们并让他们获得好收入、过上好生活？

尽管绥宁苗寨的美让我有种惊艳感，然而它没有一些旅游景点的车水马龙，甚至没有半点儿的熙攘。绥宁古苗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遗落在尘灰里的珠子，有待人们的注意。或许是因为偏僻的缘故，这里的游人很少。我当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像我这样感受它的荒芜和沾在荒芜之上的美，感受那种安静和古老，感受“走出了时间”的惬意与感慨，同时感受和思忖那些“在时间的击打之下能够站稳的”，以及“比倏忽的时间消逝的更快的”。

◎作家写作家

# 贾平凹到底有多忙

□ 周瑄璞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永远不知道贾平凹会有多忙。

每年至少要找贾老师两三回，或签名，或代朋友求字，或文友捎的东西给他，或因什么事请他写几句话。程序是这样的，先发短信（一般情况不接电话），说明缘由，他指定时间，去工作室。要锲而不舍地发短信，约五六回，得以见到。他经常的回复是：在山里月底回西安；在外地下周再约；先放你那里过几天再约一下；事情若不急再等几天……总之，没有说立即能见到的，所以朋友所托之事，我从不敢一口答应，只能说，试试吧。贾老师说的时间，一定要按时前往，因为过了点，就是下一个人了。每次去他那里，总是将前一个人“撵走”，十来分钟后，下一个人进门，我再被“撵走”。也有时候，几方人士前后几分钟进门，这个在书房立等写几句话，那个到楼上谈一下，客厅里的坐着等待，想必贾老师可能也是抽出半天时间，将来访者挂号排队，挨个接见。有一种说法：成功者都是善于管理时间的人。上帝给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每天二十四小时，若不合理安排，他哪里有时间写作呢？

当我在贾老师那里跟他谈话的时候，排在我后面的人可能在上电梯，再后面的人或许出了家门，开车上路。

好在贾老师善良温厚，所求之事多不会失望，只是需要等待。两月前，有鲁院同学安昌河托我请贾老师题写两个书名。我让他先写好短信发来，说出他这两个书名的重要性，请贾老师题写的必要性，总之，就是要打动贾老师。因为找他题字写书名的人太多，他常做之事只能是拒绝，否则，大作家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几分钟后，一条微信发来：冯翔是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2008年5·12地震中，他失去了近百位亲戚、同学、朋友，最疼爱的儿子也在这场浩劫中罹难。2009年4月，冯翔选择了极端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生前创作的反映羌族百年风云的长篇小说《策马羌寨》和散文集《风居住的天堂》，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马上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他的孪生兄长为了更好地纪念他，特别想请他们兄弟二人都非常喜欢和敬爱的贾平凹老师题写一下书名，并敬奉润笔……烦请瑄璞帮忙联系一下。感激！

我将这条微信复制，短信发给贾老师，问他可否写。贾老师很快回复：写呀。不要费用。几时要？我过三天去上海几天，回来写行吧。

当然行啊，这等于挂上号了，我转告同学，先请他放心，耐心等待就是。

贾老师上海回来，停了两天，又去上海，再次回来后，终于短信通知我：你今晚八点左右来，我九点出去。

怕堵车误了时间，我七点多就从家里出发。不想今年入冬后车辆限号，路上格外畅通，七点半就到了他工作室。贾老师刚展开纸拿起毛笔要写字，门铃响起。我去下楼开门，一位亮丽女士站在门外，原来贾老师约她七点半来，我抢占了她的时间。亮丽女士不急，坐着等待。好像所有来他这里的人，也都不急了，因为这里有一种奇妙的氛围，让人安静下来，他那一屋子的神神佛佛，挨挨挤挤，也都非常情愿地坐在那里，我们这些凡人，急什么呢。贾老师写完字下楼，那位女士早已在客厅将文件展开给他看，是使用了贾老师一篇文章，想再请他写几句话。我因没跟贾老师说上半句话，心有不甘。将写好的字摊在书房地上晾着，对二人说，等你们处理完，我要跟贾老师谈几句话。我在书房，看他小楷写了贴在柜子上的字条：美德十二条，饮食节制，言语审慎，行事有章……看他各种各样的收藏品，皆有一种大度安然的气质。只听得外面二人就文章中几句话起了争执，亮丽女士要将贾老师早年间一篇散文与她的新兴行业扯上关系，请他签字认可，贾老师表示抗议，女士一再坚持，娇滴滴地申诉理由，贾老师只好允了。按说可以走了，又让贾老师送她一本书，贾老师说我从不送人书，也没有书，女士不依，撒娇不肯走，贾老师只好从房间拿出一本自己新出的散文集，打开签名，那女士让他签一位男士的名字，再多写几句话。我拿手机录相记录下这一幕，贾老师边签书边说，我向来优待女士，基本上有求必应。可最生气的就是她弄咧半天，是给她男朋友签的。怪那女士自己不拿书来，蓄意的。女士继续撒娇，啥蓄意嘛，真的是买不到你的书了，朋友听说来见你，非要一本不可。不管怎么说，女士得逞了，开心而去。时间到了我的八点，得以坐下来与贾老师安静说几句话。

安昌河收到贾老师题写的书名，非常高兴，可能受到鼓励，又买了几套贾老师作品，毛边精装书寄来，请作家签名。两大包书，让我望而生畏，实在无力再搬去工作室，只好放在作协，请办公室人员留心，哪天贾老师来开会，一定告诉我。

那一日上午，突接小车电话：“贾老师来了，在跟钱书记谈话。”我飞奔至作协，先将两包书拆包，每本的塑封撕掉，好家伙，四套书，三十二本。作协机关的人们，也都得知贾老师到来，张三李四，大迟小冉，变戏法似的拿出

许多书来。几次去打探谈话是否结束，工作人员已将贾老师办公室门打开，不断有人将贾老师各种著作抱来，桌子上、茶几上已经聚集了上百本书。又有几位求见者陆续到来，想必是贾老师约他们在作协见面。书法家史老师要送书法展的邀请函，诗人远先生要送诗歌研讨会的邀请信，摄影家郑老师要让贾老师在他新出的《贾平凹影像集》上写几句话，作协机关李主任要给贾老师送他自己的新作。这是贾老师与新上任的钱书记头次会面，二人在书记办公室谈话，已经有一屋子人和一屋子书在这里等他，门外走廊上，还站着几位观望者。

十一点过后，听得有人说，来了，来了，但见贾老师在几个人簇拥下，进到自己办公室，先与几位来人握手寒暄，交接请柬书籍等物。门外有人说，想跟贾老师谈个事，问他多会儿有空，贾老师说，没有空啊，从早到晚都没空。然后坐下签书。每人将要签的名字早已经写好，夹在书里。史老师叮嘱了书法展的时间，就要告辞，贾老师说，等会儿，我这里签完，咱一起吃饭去。史老师于是坐下等待，其他几位客人也坐着，观摩他现场签书，好像都很迷恋这种气氛。不见有人出去，只见有人进来，一摞又一摞书搬到桌上，他一本一本地签，还抽空抬头问我，最近情况咋样？工作还满意吧？我答好着呢，他说，那就好，飞快丢过来一个笑脸。他基本可做到边签名边说话，给这个人说一句，和那个人应一声，身边人都不冷落。别人告诉我说，成套的书，他只在上面一本签对方名字，下面的，一律只签平凹二字。我不甘心，想一会看情况再说。

我们自觉形成流水线，有人提前把书打开，有人在他签完后拿走，有人挪动书堆。书桌前面，墙一般站着四五人，在他签完一本后，插空说话。司机说，某人请他吃饭，已经到工作室楼下，贾老师说，让他再等一会儿。小李手拿三份合同，说这是某出版社少儿阅读的那本书，请你过目，签字。贾老师暂停签书，在三份合同上签了字。小车小阎拿着一个文件，请他看其中一条与文学有关的内容。他抬头先夸小阎的粉红毛衣，“你这袄好看的很”，再拿过文件仔细看后，说他知道了。后勤科长来问，今天冬至，贾老师是否在灶上吃饺子？贾老师问，我这里三四个人呢，有没有那么多饺子？科长说他去看看，司机又说，工作室那边楼下，人还在等着。贾老师说声那一会儿再说，又埋头签书。他手机一直在响，司机说，这个电话已经打了几回，你接一下吧。贾老师起身接电话，走进里间门口，可又不好意思将门关上，背对着我们，就算是自己的独立空间了，在十几人的监听下，他告诉对方说，收到了收到了，我正在签书，回头再说。书桌前围站的人数，还在增加。创联部王主任拿着文件，也挤在桌前。贾老师抬头问，你啥事？王主任哈哈一笑，没事，看你笑话，谁让你当大作家。

轮到我那几摞书，搬至他眼前。他说，别人成套的，都是只签一本名字，给你，全都签了吧。我恨不得三人名字，全是冯飞这样简洁，不想偏有一位叫韩贵钧，真是抱歉得很，贾老师仍然一笔一画地签了。

我将书抱回自己办公室，拿包回家，路过二楼，贾老师办公室那里，还有人不断走进去。时间是差三分钟十二点。

不知道贾老师那天的午饭，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食话

# 过年杀猪菜

□ 董茂慧

福建汀洲古城里有条店头街，小姑娘梳着两只小髻，提着竹篮略微吃力地走在鹅卵石路上，木屐踩出清脆的“达达”声，小脸上透着红润和细密的汗珠。街上很热闹，迎新春的年味在刚刚张贴的对联里变得火红，各种手工作坊店铺林立，小姑娘每走几步就低头看看竹篮中装着“杀猪菜”的盆子是否安好，汤有没有溢出。油亮的竹篮中热汤散发出的香味让路人侧目，不断有认识的人招呼：“去送杀猪菜啊？”小姑娘使劲地挺起身子大声应道：“是，有空去家里吃啊”，更小心翼翼地护着竹篮。走到一户人家门口，脆生生地喊：“叔婆叔婆，在不在家？家里杀猪了，妈妈让我给你送猪肉粉干！”木门“咦咦呀呀”地打开，里面挤出多张脸孔，在家的都迎出来，接盆子的接盆子，招呼的招呼：“美莲啊，家里杀猪了？哟，怎么拿这么多啊，自己吃了没有呢，进来一起吃？”小姑娘羞涩地笑着谢绝挽留，提起竹篮又往下一家走去。叔婆家年龄相仿的孩子追出来，帮着美莲提篮子有说有笑地同行，把所有的杀猪菜趁热送完。

过年了，养着猪的人家从凌晨开始忙碌，请人杀猪。最亲近的邻居朋友会到杀猪人家中去帮忙，屋里屋外都是人，男人们负责砍肉剁骨，女人们负责厨房柴火，几百斤的猪杀了全家要划算着吃上小半年。每个部位的肉或骨头用于做什么都会提前细细琢磨好，腌、炸、腊、卤……一番忙乱后，赶在午饭前要给邻居、长辈们挨家挨户送上热气腾腾的杀猪菜，可以是猪肉粉干可以是氽猪肉也可以是炸猪皮。分到杀猪菜的人家自然是欢喜的，或留给老人或分给孩子。大半天忙碌下来到日落时，自然要大餐一顿以飨众人。

将新鲜的猪肉切片，以肉汤为底加碎粉干煮开，香菇冬笋切成长丝搅入，起锅时略添上些地瓜粉。稀稀糊糊的汤中，粉干是白的猪肉是粉的，再缀着丝丝金黄的笋乌黑的菇，色彩对比强烈，不饿的人看着也能食欲馋虫齐来，更不必说还有香味诱人。孩子们眼巴巴地等着将肉仔细剔除干净后的肉边嫩骨，捧着骨头就奔着街角“石臼”而去，男孩们争先恐后轮流上阵轮锤，女孩们嘻笑打闹帮忙翻动骨头，将骨头捣成浆后装起，七八个孩子前呼后拥护送回家。大人将骨浆拌

上地瓜粉、盐，揉成指头大小，炸出黄澄澄的“骨头丸子”。孩子们盯着油锅等候，才起锅就抢光也不怕烫，剩下的用陶罐存储起来，藏在粮仓里给孩子们当零食。眼尖的孩子偷偷记下陶罐的位置，趁大人不注意悄悄抓一把放在口袋，犹如中奖般开心，躲到屋外与要好的小伙伴分吃。

男人们将猪肺、小肠、窝心油等“猪八宝”炖汤，忙碌一天后汤浓肉糜，就着温米酒三五杯下肚，猜拳声就吼起来，几乎能把青瓦屋顶掀开。女人们做完腊肉香肠，把猪头肉卤好，也三三两两地各自寻伴小饮谈天，恨不能将家中从老到小、房前屋后都探讨一遍。直到月上柳梢方醺醉相携回家，“慢慢行（走），行不动了倒回来”道别声、叮嘱声、玩笑声清晰地萦绕着祖屋，渗进时光的缝隙中。

杀猪那天街坊四邻亲友的欢快热闹，年前最热闹的序曲，这些是属于我母亲的记忆。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早期，城区还仍有少数人家养猪，我也听过凌晨杀猪时惊心动魄的嚎叫，母亲说的“杀猪菜”却未曾吃过。随着生活条件的飞速发展和变化，不用说城区，农村家中养猪都难得一见，自然更无缘得见“杀猪菜”，年料在市场就可以按需要备齐，非常方便。可热闹非凡、喜气洋洋的杀猪年味只能在父母辈中的回忆里情景再现，听得多了便成为一种向往：什么时候能带着孩子共同动手，吃上“杀猪菜”？

念头生久了会想办法付诸行动，三几好友约定，四处打听到土猪凑了份子买下，腊月十五那天几户人家举巢出动浩浩荡荡奔乡村而去。宽敞的客家民居分上、下厅，分别摆着大小圆桌，主人从凌晨就已忙碌，等我们这群被馋虫附体的吃货们到达时，四处已经冲洗干净，不见杀猪的痕迹，只有厨房里待煮的猪肉。男人们挽起袖子，搬开猪肉挥起菜刀分块切细，女人们包饺子、刷锅炖汤、炸肉，孩子们冲到屋前的小溪边玩水。

我问主人：“村里可有石臼？让孩子们去打骨头，做丸子吃”，主人笑了：“现在的孩子哪里还愿意吃那个东西，石臼是有的，不如让他们去打瘦肉丸子吧！”我端着一盆子肉，带着孩子们去找石臼。乌黑油亮的木锤沉重得让我和孩子们傻了眼，摇摇晃晃举起来已经是极限，更不用说将肉块打成肉糜，兴冲冲而来灰溜溜而归，让腹黑的同伴们恶狠狠地嘲笑了一番。最后，有人出主意，用碎砖堆出个临时烧烤炉，孩子们如小麻雀般叽叽喳喳地围着烤肉，花了脸掉了肉烫着手，闹成一窝粥，也不知道他们最后吃到嘴里的多还是烤成焦碳的多。

临近中午，在主人的帮忙下，一群人方手忙脚乱地煮出满桌杀猪菜：猪血粉干、炖猪八宝、卤猪舌、红烧猪蹄、氽瘦肉……孩子们围着圆桌打闹，男人们喝着温米酒海阔天空地聊着，女人们管着孩子哄着训着，也有人端着碗埋头吃无暇顾及其他的。

忙且乱，父辈们儿时的大家族默契分工合作、老人孩童齐动手，自幼参与家务劳作、年味十足的情景淡出了岁月，刻画在老屋泥土墙的斑驳里，远去！